

THE SANE

弗洛姆作品系列

SOCIETY

健全的社会

Erich Fromm

[美] 艾里希·弗洛姆 著

孙恺祥 译

非外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SANE

弗洛姆作品系列

SOCIETY

健全的社会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孙恺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237

Erich Fromm

THE SANE SOCIETY

Copyright © 1955 by Erich Fromm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original English title THE SANE SOCIETY by Rinehart and Wiston, New York, 1955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健全的社会 / (美) 艾里希·弗洛姆著; 孙恺祥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弗洛姆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4518-8

I. ①健… II. ①艾… ②孙… III. ①社会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0305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何炜宏 邵莉莉
装帧设计 钱 璐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518-8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言

十五年前我写过一本《逃避自由》，现在这本书可说是《逃避自由》的续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我试图证明，极权主义运动吸引着渴望逃避自由的人们。现代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便想以顺从领袖、民族或国家的方式寻求新的安全感。

在《健全的社会》这本书中，我试图说明，在许多方面，二十世纪民主体制下的生活都可以被看做是又一波对自由的逃避；本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依据异化概念分析了这种特别的逃避行为。

从另一方面讲，《健全的社会》不仅是《逃避自由》的续集，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自为的人》一脉相承。在《逃避自由》与《自为的人》两书中，我讨论了与主题有关的特定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主要涉及专制性格问题(虐待狂、受虐狂等)。《自为的人》则提出了关于各种性格倾向的想法，用一种从人际关系角度出发的性格进化设想取代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①这一概念。在《健全的社会》中，我更为系统地发展了我称之为“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学”的基本观念。自然，先前提出的观点不可能略去

^① 力比多 (Libido)，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中的精神动力，即性的本能。

不提；但在本书中，我对这些观点的表述尽量简明扼要，而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我最近几年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我希望，读过前两本书的读者在读本书时不难在其中看到思想的延续及某些变化，进而接触到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论点：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他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人演变成人之后，丧失了先前与自然界保持的原始联系。于是，人类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基本感情即植根于这种需要。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的见解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过，这些看法却是以他的根本发现为基础，在他之后的一代人的观点和经验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但是，正由于本书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我想在此十分明白地指出，心理分析学说的某些发展趋势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人们在批判弗洛伊德思想体系的某些错误时，把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连同他的错误一齐丢掉了。弗洛伊德的科学方法、他的进化观念，以及他关于无意识是一种真正的非理性力量而不是一大堆错误念头的看法，都是极有价值的。此外还有一种危机：心理分析失去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挑战常识和舆论的勇气。

《健全的社会》以《逃避自由》中纯粹的批判分析为出发点，最后就健全社会如何运作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要目的并非要人相信我提出的每一种建议都必然是正确的，而是意在表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当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领域同时发生变革时，社会才会进步。任何局限于一个领域的进步都会伤及整体的进步。

我深深地感谢许多朋友，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使我获益匪浅。在此，我要特别提到乔治·富克斯，他在本书未完成之时就不幸去世了。起初，我同他商定合写这本书，但由于他病

魔缠身，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作过多次长谈，他给我写过许多信函和便笺，尤其是当涉及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时，帮助我理清思路，有时是修正我的看法。我在书中几次提到他的名字，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远甚于此。

此外，我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处的负责人 G. R. 哈格里夫斯博士，他给我提供了有关酒精中毒、自杀和他杀人数的统计资料。

艾里希·弗洛姆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我们精神健全吗?	001
第二章 一个社会是否会生病?——社会常态的病理研究	008
第三章 人类状况——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关键	016
人类状况	016
根源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人的需要	021
第四章 精神健康与社会	054
第五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063
社会性格	063
资本主义的结构	067
第六章 其他各种诊断	173
十九世纪	173
二十世纪	181
第七章 各种解答	197
专制主义的偶像崇拜	200
超级资本主义	202
社会主义	207
第八章 通向健全之路	224
概论	224
经济改革	229
政治改革	284
文化改革	288
第九章 结论	296

第一章 我们精神健全吗？

生活在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人精神十分健全，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观念了。虽然事实上我们之中很多人患有或轻或重的精神疾病，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怀疑我们精神健康状况的整体水准。我们相信，通过引入一些更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我们就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至于个人的精神障碍，我们仅仅视之为个别事件。也许我们会感到惊讶，在据称是健全的文化中，竟会出现这么多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有把握说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许多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确信，除了自己，人人都是疯子。许多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性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作出的正常反应。我们自己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以精神病学的方式来看看这些事实吧。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战争”的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除了小规模战争之外，在一八七〇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坚信，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敌对的一方在一段时间内常常被视做是残酷的、丧失了理性的恶魔，为了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必须击败他们。但是，在相互残杀事过境迁之后短短几年，昔日的

敌人便成了我们的朋友，而昔日的朋友却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又在一本正经地重新划分敌友了。在一九五五年的今天，我们又在一场大屠杀做准备了。如果这场屠杀实现的话，其规模将超过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杀戮。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将被用于这一目的。大家都怀着混杂了自信与忧虑的心情指望各国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战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赞颂他们。不过，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引起了战争，常常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制造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理智地处理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事务。

当破坏和怀疑一次又一次爆发时，我们的表现与过去三千年来的文明人类的表现并无二致。按照维克多·夏比莱的说法，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一八六〇年间，人类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不少于八千个，每一个都被认为能维持永久的和平，但每一个的平均寿命才不过两年而已！^①（编按：本书注释除非特别标明，皆为原注。）

我们的经济方向很难令人振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之中：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常常意味着一场经济上的灾难；我们限制一部分农业生产力，以便“稳定市场”，尽管有数百万人正急需我们所限制的东西。目前，我们的经济体系运转良好，原因之一是，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制造武器。企业家们担心我们停止生产武器；那种认为国家不应生产武器，应该建造房屋，以及生产其他有用的东西的想法，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

^① 参见 H. B. 斯蒂文斯的《文化的复苏》，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纽约，1949年，第221页。

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作下，用廉价的、缺乏真实感的垃圾，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一方面，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毒害，另一方面，我们却高兴地看到，银幕上没有“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那些启迪和提高人们智力的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我们已经将每日的平均工作时间减少到了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描绘这幅人人都熟悉的图画呢？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精神是否健全；要是他还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行为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的诊断的正确性就更毋庸置疑了。

可是，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缺乏健全的精神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精神健康的问题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的个体，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不适应的情况。本书要讨论的是后者，即，不是研究个体的病理，而是研究**普遍的病理**，尤其是当今西方社会的病理。在讨论社会病理这个复杂的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些有关西方文化中的**个体病症**的发生率的资料，这些资料本身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西方各国精神疾病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呢？最令人惊讶的是，关于这

个问题，居然没有什么资料可查。在物质资源、就业情况、出生率和死亡率方面，我们都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而在心理疾病方面，我们却缺乏充分的资料。在这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和瑞典，我们有它们的一些确切的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也只涉及精神病患者的就医情况，对估计心理疾病的相对发生率并无帮助。关于精神病护理、医疗设备的改善情况，以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的程度，我们能得到的数据也少得可怜。^①美国所有医院的大半病床都被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了，在他们身上我们每年花费十多亿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增加了，只能说明护理加强了。不过，其他一些数字却较好地说明了更严重的心理障碍症的发生情况。如果上次战争中美国免征入伍的人员有 17.7% 是因为精神病的话，那么，即使无法比较过去的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这个事实也确实说明了心理障碍症的高发率。

我们可得到的反映心理健康的大略情况的可资比较的资料仅仅涉及自杀、他杀和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假设某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原因。但是，即使我们不马上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也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假设：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精神不够健康和稳定。所有数据都清楚地证明，这种情况并不是物质贫乏的必然结果。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率却最低；而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伴随着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②至于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这也是精神和情绪不稳定的症状。

① 参阅 H. 戈德哈默和 A. 马歇尔合著的《精神病与文明》一书，自由出版社，格林科，1953 年。

② 参阅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一书，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巴黎，1930 年，第 109、112 页。

杀人动机大概不能像自杀动机一样清楚地表明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虽然在他杀率高的国家自杀率低，但如果把这两者相加，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杀人和自杀都视做“破坏性行为”，那么，下面几个表格表明：两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 4.24 与 35.76 之间浮动。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矛盾。弗洛伊德假设，破坏性行为的发生概率是相对恒定的，而这个假设是他的死亡本能理论的基础。表格中所列的数据反驳了这种说法：破坏性行为的发生概率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在针对自身和针对外在世界这两个方向上有所不同。

以下三个表格是欧洲和北美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关于自杀、他杀以及酒精中毒人数的统计。

表格一

国 家	自杀人数(每 10 万成年 人)	他杀人数(每 10 万成年 人)
丹 麦	35.09	0.67
瑞 士	33.72	1.42
芬 兰	23.35	6.45
瑞 典	19.74	1.01
美 国	15.52	8.50
法 国	14.83	1.53
葡萄牙	14.24	2.79
英格兰和威尔士	13.43	0.63
澳大利亚	13.03	1.57
加拿大	11.40	1.67
苏格兰	8.06	0.52
挪 威	7.84	0.38
西班牙	7.71	2.88
意大利	7.67	7.38
北爱尔兰	4.82	0.13
爱尔兰(共和国)	3.70	0.54

表格二

国 家	破坏性行为(自杀与他杀人数之和)
丹 麦	35.76
瑞 士	35.14
芬 兰	29.80
美 国	24.02
瑞 典	20.75
葡萄牙	17.03
法 国	16.36
意大利	15.05
澳大利亚	14.60
英格兰和威尔士	14.06
加拿大	13.07
西班牙	10.59
苏格兰	8.58
挪 威	8.22
北爱尔兰	4.95
爱尔兰(共和国)	4.24

(以上两个表格依据的是 1946 年的统计数字)

表格三

国 家	估算出来的酒精中毒人数(不论是否有并发症)(每 10 万成年人)
美 国	3,952(1948 年)
法 国	2,850(1945 年)
瑞 典	2,580(1946 年)
瑞 士	2,385(1947 年)
丹 麦	1,950(1948 年)
挪 威	1,560(1947 年)
芬 兰	1,430(1947 年)
澳大利	1,340(1947 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1,100(1948 年)
意大利	500(1942 年)

我们只要略看一下这些表格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及美国的自杀率以及自杀率与他杀率之和最高，而西班牙、意大利、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的自杀率和他杀率最低。酒精中毒的数字显示，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美国、瑞士、瑞典、丹麦），酒精中毒率也高，不同的只是美国高居首位，法国从第六位跃到第二位。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震惊。纵然我们可以怀疑，单是自杀率高是否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人精神不够健康，但自杀和酒精中毒的人数排名大体一致的事实似乎说明，我们在此抓住了精神不平衡的症状。

于是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经济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症状。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精神不平衡的症状！确实，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但至少它们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在我们对整个问题作详细讨论之前，这些资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否存在某些根本性的错误？

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是否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厌烦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的方式？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证明了“人不能单靠食物而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并没有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需要是什么呢？

以下几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就当代西方文化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制度下的人们精神健康和健全的影响作一番批判性的评估。不过，在对这些问题作专门的讨论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讨论一下社会常态病理这个一般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本书所表达的总的思想倾向的前提。

第二章 一个社会是否会生病?——社会常态的病理研究^①

一个社会整个地在精神上不够健全的说法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当今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持的**社会相对主义** (sociological relativism)立场对立。这些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能运转，它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健全社会”这一说法包含着一个与社会相对主义不同的前提。只有假设不太健全的社会，这种说法才有意义。这种说法暗示，世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来判断每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这种**标准人本主义** (normative humanism) 的立场基于几个基本前提。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术语来给“人”这个种属下定义。人类社会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基本精神素质，共同的支配他们的精神和感情运行的规律，都以圆满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为追求的目标。诚然，我们对人的了解还很不够，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的定义。“人学” (science of man)的最终任务便是对那些

^① 在本章中，我引用了我的《神经症的个人和社会根源》一文中的观点，见《美国社会学评论》第九期，1944年4月，第380页及其后。

可以称为“人性”的东西给出正确的描述。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人性所具有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指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人们根据这种错误的定义辩护说，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结构的必然结果。

与人性概念的这一极端保守的用法相反，自由主义者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既真实又重要。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具有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盖上它们的印记。这种观点和与它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对社会进步也起着破坏作用。真正的问题是从人性的无数**表现形式**——包括正常的和病态的形式——中推断出整个人类共有的**根本的东西**；这些形式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个人身上和不同的文化之中观察到。这项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人性的内在规律以及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这种人性概念不同于“人性”一词的惯常用法。人在改造他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他自己。事实上，人创造了他自己。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和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和改变他自己。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便是开发这种潜力，并按照人性的可能发展方向来改造这种潜力。如果说“生物学的”观点及“社会学的”观点是把人性的两个方面相互割裂开来的话，那么，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既不是“生物学的”，也不是“社会学的”，而是超越了这种二分法的。这种观点认为，人内在的主要感情和动力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产物，这些情感和动力是明确的，可知的，一部分有益于健康和幸福，另一部分则易于造成疾病和不幸。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会创造这些基本的感情和动力，但却决定着哪几种潜在的感情会比较普遍或者占据优势地

位。当人出现在任何一种既定的文化中时，他总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表现的具体情形却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情况决定的。婴儿一生下来就具有人的一切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得到发展；同样地，整个人类也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变成它潜在地可能成为的样子。

标准人本主义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人的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如果依照人性的特征和规律发展至成熟，他的精神就会是健康的。精神疾病的发生即由于没能实现这种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精神健康的标准并不在于个人能否适应某个特定的社会秩序，它应该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准则，能够就人的存在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关于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人们在观念上的“共同确认”（consensual validation）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大多数人共同具有某些思想或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就必定是正当的——这种想法十分幼稚。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这种“共同确认”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毫不相干，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数百万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都患有同样的精神疾病，这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

不过，个人的精神疾病与社会的精神疾病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意味着我们应区分两个概念：**缺陷**和**神经症**。如果一个人无法获得自由，没有自发性，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又认为自由和自发性是人人都应达到的客观目标，那么，他就可能被视为有严重缺陷。如果这样一个目标没有被一个既定社会的多数成员达到，那么，我们谈论的就是社会造成的缺陷现象。一个人和其他许多人共有某种缺陷，但事实上，他自己并